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述评】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一）	蒋 健
【亡灵祭坛】	文革受难者群体之一：有宗教信仰的人	王友琴
【生逢乱世】	且与鬼狐为伍	蓝英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述评】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一）
——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

· 蒋 健 ·

46年前发生的“林彪事件”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之一，更是迄今为止尚有许多谜团未解的中国现代最大政治事件。狭义的“林彪事件”专指1971年9月12日夜至13日凌晨发生的“林彪出逃”，又称“九·一三”事件，而广义的“林彪事件”涉及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交替发生的林彪集团倒张（春桥）、毛泽东保张进而倒陈（伯达）的活动，以及其后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南巡，林彪之子林立果主谋杀毛不成进而企图南下另立中央的系列阴谋活动。

相应的研究从“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开始了，最初的动力来自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给林彪集团定性和定罪的需要，以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告一段落。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后，出于“了结过去”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再度审理林彪集团案，并将林案与江青集团案（即“两案”）一起交由重建的中纪委审查。197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8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召开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1）1979年9月3日，邓小平为“两案”审理定调。（2）尽管“两案”审理显然是用法律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但其审理方针声称重证据，所以对毛泽东时代专案组“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允许当事人翻供，而且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倒张”的活动也不再成为他们的罪证。1980年11月20日“两案”审理正式开庭，1981年1月25日审判完毕。“两案”审判结束的次日，邓小平对外声称：中共中央正在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这次审判和稍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都了结了，不再纠缠。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3）1981年6月下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自此以后，中国大陆关于林彪事件的说法和研究，几乎都在该决议和“两案”审判结果划定的框架内，比如，“两案”审判特

别法庭副庭长、第二（林案）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关于“两案”审理过程的回忆，〔4〕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关于林彪事件的系列研究。〔5〕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方面，追求历史真相是人的天性之一，还原历史真相更是历史研究者的天职；另一方面，不平则鸣，无数感到不公的林彪事件涉事人和 / 或其亲属、部属，为了他们的名声和利益，必然要诉说他们的种种冤情，发出他们的“一面之词”。

此外，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往事》、《记忆》和《昨天》等中国大陆电子传媒，为林彪事件的研究者提供了便易的学术互动平台。近年来，出现在电子传媒上关于林彪事件的文献，百家争鸣，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同时期传统媒介可比。

笔者意图在此尽可能全面地回顾 46 年来出现的林彪事件文献，重点放在各种层次当事人的回忆，也涉及不同立场研究者的探讨和相互争论，同时给予适当点评，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以及对这个专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文献指引。

一、来自毛泽东时代的史料

（一）中央专案组整理的三批材料

1971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1〕77 号文件，主要内容即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72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2〕4 号文件，主要内容即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1972 年 7 月 2 日发出中发〔1972〕4 号文件，主要内容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这些材料无疑代表了毛泽东、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对林彪事件的立场和看法，存在着“逼供信”和牵强附会之类的问题。

（二）来自军队的材料

1973 年 5 月空军印发了《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林彪死党江腾蛟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汇集》《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和《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两年后又印发了《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在空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和《林彪死党吴法宪的罪行材料》。〔6〕

1974 年 5 月，海军政治部发出名为《吴瑞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严重错误和罪行的部分材料（供批林批孔用）》的小册子。

北京军区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下发了郑维山的“罪行材料”。〔7〕

上述材料虽披露了某些真实细节，但都不乏“逼供信”造成的伪证和牵强附会的说法。

二、来自“两案”审理时期的史料

在“两案”审理期间，毛泽东时代认定的“林彪反党集团”被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而称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了。（8）不过，毛泽东时代关于林彪集团“谋杀毛泽东”“阴谋南下另立中央”（即“两谋”）和“叛国投敌”的定性没有变，用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概括就是：“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

这个时期关于林彪事件的史料除了收录在《历史的审判》（9）《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10）等专集之外，在此后出版的领导“两案”审理的邓小平、彭真、伍修权、黄火青（11）等人的传记、年谱和/或回忆录也有所提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篇全方位描述林彪事件的报道，即：刘回年等人的《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和靳大鹰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12）它们后来分别被《历史的审判》《林彪事件真相》和《林彪1959年以后》（13）等专题图书多次收录，并被《大动乱的年代》（14）、《风云九·一三》（15）和《晚年周恩来》（16）等著作所引用。笔者认为，这些报道中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失实问题，比如，引用毛泽东时代中央专案组的不实材料。

三、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史料

（一）参与“两案”审理报道记者的长篇纪实

解放军报记者邵一海在其“两案”审理期间发表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史料，从1985年2月起，陆续发表在新创刊的《追求》杂志上（17），后被结集成书以两个版本出版。（18）邵一海最早披露了《“571工程”纪要》的发现过程。（19）他还最早披露了林立衡、刘吉纯、林彪内勤小张、林彪内勤小陈、李文普、姜作寿、于仁堂等亲历者在事后的回忆材料，（20）这些材料对于还原“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的北戴河现场的“全景”是很有价值的。

参与了“两案”审理报道的空军报记者张聿温的《温都尔汗爆炸记》（21）也全方位描述了林彪事件，该书利用了《“九·一三”事件始末记》提供的一些素材，对林立果“小舰队”活动的描述尤为详细，对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活动的描述有助于还原空军学院林立果秘密据点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与《“联合舰队”的覆灭》《温都尔汗爆炸记》同在1988年出版的《叶群野史》（22）也全面描写了林彪事件，该书的书稿在1982年就已经完成，（23）该书的部分内容后来被一些杂志选载。（24）但因其书名以及作者不大为人知的缘故，笔者目力所及，未见任何林彪事件研究者的著述提及该书。实际上，该书的作者“南枝”就是参与了“两案”审理报道的人民日报著名记者胡思升，他当年发表的《开庭之日》《元帅之死》《铁骨忠魂》《初审吴法宪》《“无法无天”的历史不能重演》《江青的最后表演》《罪该一死》《血压为何偏高》《十名被告面面观》《可怜的辩护》等报道，其中的前五篇被《历史的审判》所收录。（25）该书虽名为“野史”，但很多内容是可信的，比如，1971年“七月底，毛泽东向政治局的委员们推荐一本名叫《何典》的书，特别介绍了其中的四句话：‘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26）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得到证实。（27）笔者认为，该书中关于叶群与黄永胜苟合、林立果窃听的叶群与黄永胜一次通话的内容（28）颇具史料价值。不过，笔者认为，这个时长157分钟的录音录的不只是叶、黄一次通话的内容，更不认为林立果偷录的时间只是“一九七〇年深秋的一个夜晚”。（29）因为录音中叶群提到叶、黄苟合的时间是6月21日，还提到她可能怀孕了，如果需要流产，希望黄来看看她……，而叶群9月专门为打胎

一事从北戴河回过北京，所以不可能“深秋”还在谈论“那个没有来”；再者，那个时代的录音技术有限，而林立果自8月下旬随林彪上庐山起，直到11月下旬张云生离开林办也没有回过毛家湾（30）；另外，录音中提到的林彪在苏州“哭了”而且是“哭政治上”的，叶群则是既哭“政治”又哭“责任”，显然是1971年2—3月的事，这段内容可能是1971年4月下旬“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偷录的。

（二）林彪家人及与林家密切接触者的回忆

香港《镜报》1988年6月号刊登的《“九·一三”事件前前后后的林豆豆：林豆豆访问记》后被国内转载（31），因而被国人广泛所知。受访的林立衡对“九·一三”事件叙述的核心就是吃了安眠药睡下的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拉走的，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后来各种公开版本的林立衡式“九·一三”事件叙述的源头。另外，文中提到的程世清、汪东兴的一些说法，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张云生在文革时期给林彪做了四年多的秘书，他撰写的《不堪回首的岁月》（32）和《毛家湾纪实》（33），披露了他在林办时的所见所闻，涉及林彪的工作生活、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明争暗斗和林彪家庭内部的严重矛盾，尤其是叶群和林立衡的尖锐对立。关于“林彪事件”，张云生提到了林立果在第一时间对庐山会议的看法：“庐山这里出事了！”“主任（指叶群）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经挨批了。主任和李、吴、邱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的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指林彪）的威望也受了损失。”“在首长跟前，她经常哭鼻子，他妈的，这怪谁？都怪她自己！”“也不能说首长没有一点责任。由于主任惹了乱子，首长还在会上做了几句自我批评，最后主席保了首长。现在是集中批陈，但陈的后台是主任。”（34）张云生还详细回忆了庐山会议后叶群对他的勾引，他当时就把叶群的丑行告诉了林办的于运深、李文普、李春生等人，“大家都对叶群切齿痛恨。这样一来，在毛家湾的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在抵制叶群方面抱成了一团。”于是，叶群成了“瞎子”“聋子”。（35）笔者认为，了解了张云生披露的背景后，就不难理解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前夕在叶群眼皮子底下搞事却没人向叶群报告的缘由了。

张宁是被林家认可的林立果未婚妻，她在“九·一三”事件前夕与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立衡都有接触，事件发生后她和林办工作人员在一起被办学习班，因此她的回忆——《扭曲的虹》（36）对于了解“九·一三”事件有一定价值，特别是她亲历亲闻的林立果在9月8日下午和9月12日之夜的言行。

（三）外交部亲历者的回忆

针对美国出版的英文书《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及其台、港中文译本（37）所造的诸多谎言，其核心是林彪被毛泽东策划害死于北京西山，曾经勘察过林彪坠机现场的原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于1987年初以笔名发表了《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38）证实林彪死于蒙古。随后，中共中央党校于南教授给孙一先看了胡耀邦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其中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编写“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二人“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于是孙一先向外交部相关领导和部门建议组织编写有关材料，以驳斥《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编造的谎言。（39）此后，去过林彪坠机现场的原驻蒙古使馆大使许文益和三位工作人员（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分别撰文披露了勘察林彪坠机现场以及与蒙方交涉的经过（40），原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撰文回忆了

外交部应对“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提到与上级周恩来以及下级许文益、孙一先的互动。（41）

（四）专题资料汇编

周明主编的六卷本《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42）在第二卷、第四卷和第五卷分别收录了“两案”审理期间邵一海和靳大鹰的两篇报道、伊白的《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和张宁的《扭曲的虹》。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为配合建国后党史的教学和研究，编印了十四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序号从19到32，其中由王年一选编的第26—28册，即《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册（43），收录了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文件、报刊重要文章，并在《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面附录了前面提到的刘回年、许文益、伊白、符浩、张宁等五人的文章。（44）

《林彪事件真相》一书收录了聂荣臻回忆录关于文革林彪的部分，前面提及的邵一海、靳大鹰、许文益、符浩、张宁等人的文章，托名一位林办秘书（名为“何一伟”，实为“张云生”（45））对叶群的琐忆，以及林彪在文革期间的部分言论。（46）

（五）中共官员的回忆

伍修权的回忆录描述了黄、吴、李、邱和江腾蛟在文革中的罪行，默认黄、吴、李、邱都对“两谋”不知情，比如，1971年9月10日那一天，黄永胜与叶群通了五次电话，最长的一次达135分钟，通常认为两人是在商量政变的事情，而且黄永胜在法庭上也说不清两人到底谈了什么，但伍修权一言以蔽之：“不可告人的私房话”。（47）

原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回忆录介绍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回忆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春桥、江青等人的嚣张，其朋党的胡乱作为，他们硬说1971年7月的“北兵南调”是配合林彪的南下另立中央，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48）林彪事件重要亲历者、原林彪专案组主要负责人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在1988年1月对人说：“关于‘九·一三’事件，国内出的书刊也报道过不少。有一套书《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叙述的‘九·一三’事件（49）基本上是真实的。我看过。”他还回忆了毛泽东听闻林彪出逃的最初反应，毛泽东在确认林彪之死后的表态——“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以及毛泽东布置抓捕林彪集团中人的细节。（50）

四、1990年代出现的史料

对于在国内出现的史料，笔者尽可能提供最早、最原始的出处，一个原因是让读者知道当事人最初回忆时的年纪，再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史料在被收录或转载时并非原貌，比如，《作家文摘》1994年7月8日刊登的关于汉纳姆对林彪事件真相调查的报道。此外，同一个作者或同一个系列延伸到21世纪的同一个专题著述，也放到本章了。

（一）林彪事件重要亲历者的回忆

李德生的《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51）和汪东兴的《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52）都是国内影响很大

的关于林彪事件的个人回忆，但他们的回忆中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比如：李德生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10点多钟”直接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林豆豆的报告；汪东兴虽然说是他把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打电话告诉周恩来的，但他把林立衡向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时间错误地记成“9点20分左右”。对于当夜叶群与周恩来的那次关键通话，李德生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而汪东兴一反他1980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说法，改口说电话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值得一提的是，熊华源、安建设主编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同时收录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和《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二文，但在他们整理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大事记”中明确提道：“当夜，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53〕更值得一提的是，汪东兴在他后来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维持了他的说法，〔54〕而李德生则在他后来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改变了他的说法，〔55〕《周恩来传》采用的是汪东兴的说法。〔56〕搞清楚个中缘由对研究者如何辨析林彪事件的史料是有益的。

吴德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57〕是一篇极具现场感的个人回忆，提供了很多周恩来、毛泽东应对“九·一三”事件的细节，比如，对于《“571工程”纪要》，因为它用词恶毒，纪登奎认为不宜下发，但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当然，吴德也有对时间记忆不准的错误，比如，把他看到《“571工程”纪要》的时间错记成黄永胜、吴法宪被隔离审查之前了。

张耀祠在林彪事件中的经历与汪东兴类似，而且“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他同汪东兴在一起，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的有关内容〔58〕比汪东兴的回忆更具现场感，拥有更多的细节。笔者认为，张耀祠回忆的9月12日深夜叶群、周恩来通话的内容〔59〕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张不仅说该次通话是叶群发起的，而且通话结束时叶群的态度也与汪东兴的说法截然不同。需要一提的是，张耀祠回忆录2001年和2008年的两个增修过的版本仍然坚持了原先的说法。〔60〕

原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回忆了他所经历的林彪事件，〔61〕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受到过毛泽东的召见，“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他被周恩来紧急召唤到人民大会堂应对惊天事变。不过，笔者认为，陈所回忆的9月13日凌晨1时30分接到李德生的电话、凌晨2点多钟在人民大会堂还见到李德生的说法，显然有误。搞清楚陈先瑞到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开会的准确时间对还原“九·一三”事件的场景是有益的。

（二）来自“两案”审理参与者的史料

根据图们亲身经历写成的《超级审判》和《震惊世界的77天》〔62〕透露了许多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史料，比如，林立果偷录的叶群、黄永胜通话记录，〔63〕周恩来对海军的“林彪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问题报告”的有关段落批示“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64〕李文普在1980年1月23日对他1972年写的不实揭发交代进行了更正，〔65〕吴法宪在“两案”预审期间对他1972年3月交代的他事先知道林彪要搞政变供词的翻供过程。〔66〕

笔者认为，图们回忆中最有价值的史料是程世清的交代供述。据程世清交代：1971年9月1日、2日，毛泽东单独两次同程世清谈话，他“向毛主席报告主要内容是：1.庐山会议期间，8月24日晚12时，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向毛主席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

群抓住，要从林豆豆那里了解情况。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周宇驰两次来南昌活动，这次来很神秘、鬼祟，把过去江西改装的一辆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林豆豆同我的家属说：程政委心直口快，以后少同我们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里的人是有矛盾的；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的病是不是叶群搞的。……主席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你同我说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假若这份交代的真实程度达百分之七、八十，即可解开毛泽东究竟何时察觉有危险伴随其南巡因而提高警惕之谜！因为据汪东兴讲：“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毛主席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67〕张耀祠回忆录提到“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向毛主席谈了三点”。〔68〕这三点与程世清上面的供述类似，显然，这位负责人就是程世清。

不过，图们的回忆中也有毫无证据的内容，比如，1971年9月8日，在林彪给林立果、周宇驰写下手令的“同时，叶群给黄永胜送去密封亲启件——‘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69〕

参与了“两案”审理报道并有两篇报道被《历史的审判》一书所收录的原新华社记者李耐因所写的《“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70〕很有价值，因为其素材来自江青被捕后在江青住处查获的部分电话记录。

伍修权的女婿、《伍修权传》的作者卢弘所写的《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受审记》〔71〕也披露了一些林彪事件史料，而且还“为读者提供一些‘正史’以外的‘野史’或‘花絮’性材料”，即：“虽已‘徐娘半老’却又情欲未减的叶群，因林彪体质太弱干不了那事，就把著名的‘情场老手’正投靠门下的黄永胜拉入她的怀抱，权欲加性欲使他们搞到了一堆缠成一体，连叶群的儿子林立果也发现并对此进行了‘侦察’和‘取证’，秘密录下了自己母亲与人私通的私房话。”

刘回年在《重大事件亲历》和《“两案”审判的新闻报道》中透露：“为了搞清林彪的罪行，我们到专案组翻阅了大量材料；又到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地，了解他和叶群的腐朽生活；还看了林彪一个秘书写的《毛家湾见闻录》。”而且，为了“写得清清楚楚，令人信服，又有现场感”，还采访了汪东兴等当事人。〔72〕

（三）中南海摄影师披露的史料

从1992年起，原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通过作家顾保孜《红墙里的瞬间》红镜头系列作品，〔73〕向公众披露1971年林彪两次对毛泽东“不辞而别”的故事。杜修贤的说法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所收录，并被广泛认同和引用，比如，《周恩来传》就说：“林彪对开了半个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怒。这年‘五一’节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的林彪满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连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楼上只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74〕又如，高文谦拿它来说明林彪“并不按照‘善用兵者隐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75〕高华则拿它来说明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大耍“个人英雄主义者”脾气。〔76〕不过，近年来一些亲历者的回忆，特别是相关影像被发掘出来，丁凯文、蒋健据此认为杜修贤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77〕

注释：

- 1、马克昌：《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西安：长安出版社，2007，页28—29。
-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551—552。
-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同上，页709—710。
- 4、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页310—329。
- 5、于南：《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1992年3期；于南：《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南巡考述》，《党的文献》，1993年5期；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处置林彪叛逃事件述实》，《党的文献》，1994年4期。
- 6、空军大批判组：《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在空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林彪死党吴法宪的罪行材料》，1975年。
- 7、北京军区党委：《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汇编》，1974年4月29日。
- 8、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344—353。
- 9、《历史的审判》编辑组：《历史的审判》，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历史的审判》（续集）编辑组：《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 10、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 11、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232—238。
- 12、刘回年、赵琦、徐心华、周慈朴、杨金洲：《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4日；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没》，《解放军报》，1980年11月24，25，26日；靳大鹰：《“九·一三”事件始末记》，《时代的报告》，1980年4期。
- 13、江波、黎青：《林彪1959年以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 1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15、张聂尔：《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 17、邵一海：《一个“超天才”的来历》，《追求》，1985年创刊号，72—81页；《一支反革命别动队》，《追求》，1985年2期，73—82页；《庐山风云》，《追求》，1985年3期，页70—81。
- 18、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林彪王朝黑幕》，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 19、《“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页100—106。
- 20、《“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页270—283。
- 21、张聿温：《温都尔汗爆炸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 22、南枝：《叶群野史》，沈阳，沈阳出版社，1988。
- 23、南枝：《叶群假党员之谜》，《八小时以外》，1982年3期，页46—48。
- 24、南枝：《〈叶群野史〉三章》，《名人传记》，1989年3期，页84—94；南枝：《毛泽东南巡前后的林家王朝》，《炎黄子孙》，1989年6期，页36—40。
- 25、《历史的审判》，254—258，369—375，376—381，405—410，页488—493。
- 26、《叶群野史》，页148。

- 27、《吴法宪回忆录》，页860。
- 28、《叶群野史》，页112—125。
- 29、同上，页118。
- 30、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页401、425。
- 31、萧萧：《“九·一三”事件前前后后的林豆豆》，《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21期，17—28页；《林豆豆今昔——林彪女儿对林彪出走的披露》，见石翔选编：《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385—406。
- 32、张云生：《不堪回首的岁月》，《秘书之友》，1986年1—5期。
- 33、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出处同前。
- 34、《毛家湾纪实》，页397—398。
- 35、同上，页408—420。
- 36、张宁口述，胡存廉等整理：《扭曲的虹》，《东方纪事》，1988年3期。
- 37、姚明理：《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姚明乐《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1983。
- 38、伊白：《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万象》，1987年1期。
- 39、孙一先：《在大漠那边》，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318—328。
- 40、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党的文献》，1988年1期，页66—73；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一）和（二），《世界知识》，1988年1和2期；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党的文献》，1988年1期，页74—77。
- 41、符浩：《“九·一三”事件补白》，《党的文献》，1988年1期，页62—66；《“九·一三”事件补遗》，《炎黄子孙》，1988年创刊号，页43—45。
- 42、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1—3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历史在这里沉思》4—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 43、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北京，党史出版社，1988。
- 44、《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页559—641。
- 45、《毛家湾纪实》，页427。
- 46、于弓：《林彪事件真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
- 47、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页319—321。
- 48、《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页278—313。
- 49、笔者注：指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和靳大鹰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
- 50、王灵书：《纪登奎与我的一次谈话》，《瞭望周刊》，1989年21期，页42—44。
- 51、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炎黄春秋》，1993年11期，页4—11。
- 52、汪东兴：《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1期，23—35页；《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页10—21。
- 53、熊华源、安建设：《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44。
- 5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页205。
- 55、《李德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18。
- 56、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97。

- 57、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页47—62。
- 58、《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页89—127。
- 59、同上，页109—110。
- 60、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页163—164；《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页195—196。
- 61、《陈先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页452—467。
- 62、肖思科：《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图们、肖思科：《震惊世界的77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纪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 63、《超级审判》，页87—91。
- 64、《震惊世界的77天》，页77。
- 65、《超级审判》，页192—193。
- 66、《震惊世界的77天》，页88—90。
- 67、《超级审判》，页152—154。
- 68、《张耀祠回忆毛泽东》，页104—105。
- 69、《超级审判》，页157。
- 70、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炎黄春秋》，1997年7期，页47—49。
- 71、卢弘：《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受审记》，《文史春秋》，1999年4期页10—16，5期页34—39，6期页15—21。
- 72、刘回年：《重大事件亲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15—256页；《“两案”审判的新闻报道》，《百年潮》，2007年6期，页18。
- 73、顾保孜：《红墙里的瞬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69—90页；《林彪与毛泽东对峙的一瞬》，《大江南北》，1992年5期，页14—17；《镜头下的中南海》，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页66—86。
- 74、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92。
- 7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 76、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8年5月号。
- 77、丁凯文：《寻找真实的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页548—550；蒋健：《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记忆》101期，2013年8月31日。

（未完待续）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启之主编，2019年11月

~~~~~

## 【亡灵祭坛】

文革受难者群体之一：有宗教信仰的人

• 王友琴 •

1966年8月，发生了文革的第一个暴力杀戮高潮。红卫兵学生杀害了数千名和平居民：教员，校长，作家，有自己的房产的人，等等。红卫兵的口号之一是“彻底砸烂旧世界”。这“旧世界”包括学校制度，文学艺术，房屋私有制度，商业规章制度，还有宗教，等等。这里写的，是信仰宗教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文革的主要受难群体之一。

那个八月，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作“红八月”。以后的人们不了解历史，不会理解那“红”实际上是血的颜色。暴力杀害始于八月初。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八月下旬暴力达到了高潮——在北京，红卫兵每天打死三位数的和平居民。

暴力性反宗教活动是八月十八日之后开始的大规模的“反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重要一部分。

在上海，1966年8月23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校的红卫兵砸了徐家汇天主堂。这是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堂，一座相当壮观的大建筑。红卫兵把两座60米高的钟楼上的大十字架拉了下来，砸毁了耶稣圣像。教会的主教等神职人员遭到野蛮“斗争”。他们被戴高帽子，被挂牌子，被游街，被殴打，等等。红卫兵还把痰盂里的脏水倒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这座建筑随后被用来做仓库。文革结束三年后的1979年，这座教堂才被归还给教会。

在北京，1966年8月24日，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等十余所中学的红卫兵在位于市中心的东单三条的玛丽亚方济格修女会“斗争”了八名外国修女和那里的其他中国人。这些修女从民国时期就在那里办有一所圣心女子中学。到文革前，北京的一些外国使馆人员把孩子送到那里上学。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修女们被强迫弯腰九十度做“认罪”姿势。她们随即被北京公安局宣布驱逐出境。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件事情，大标题是《取缔反动修女会，驱逐八个外国修女》。

在远离北京上海的西藏拉萨，也并不在时间上滞后多少。8月24日，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开始破坏寺庙，包括著名的“大昭寺”。红卫兵砸坏寺庙建筑和佛像，焚烧佛教典籍。像北京一样，拉萨红卫兵也对“阶级敌人”实行“斗争”和“游街”，其中包括僧侣。据有关资料，西藏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庙到1976年剩下了八座。（《杀劫》，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作者：泽仁多吉，唯色）

从当时的报纸，可以看到中央和省市的领导人，热情支持红卫兵行动。但是红卫兵行动的血腥暴力行为，却从未得到报道。

这里写了四名有宗教信仰的北京居民，他们分别在1966年8月25日，26日，27日，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他们的被害从不见报道也不见记录。至今也没有作恶者对他们的死表示道歉。为什么？怎么可以？

今天，让我们记录和纪念他们。

感谢接受我的采访的人们。特别感谢华新民女士，她引领我做了采访并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

王友琴 写于2020年8月25日，“红八月”暴行54年后

◇ 陈慧恩：女，基督教徒。生于1917年。住在北京。1966年8月27日，她被来抄家的北京第67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时年49岁。

陈慧恩三岁时左腿上生疮，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溃烂到了无法医治的情况。她被遗弃在上海孤儿院。孤儿院是基督教会办的。在治疗过程中她的左脚自膝盖以下被截去，装了义肢。她在孤儿院跟外国修女长大，也跟她们学了英文。她从上海圣玛丽女校（St. Mary's Hall）毕业后在海关总署当统计员。1950年随机关搬迁全家到北京。

陈慧恩的丈夫钟永生是个瓦工。他们二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中认识并结婚。钟永生曾经进入中国建筑公司工作。“政治学习”时，他说不能接受“人是猿变的”理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1957年，他们夫妇被动员带着小儿子到吉林倪家屯农村当农民。1958年，为了小儿子的上学问题，夫妻决定回北京。他们开始住在海淀区青龙桥的一个破老爷庙里，后来租到一间12平米的小瓦房，没有卫生设备。地址是海淀区颐和园西北青龙桥北上坡10号。

陈慧恩在去吉林前就已经辞职，家庭经济主要靠钟永生做瓦工临时工的收入。陈慧恩最大的梦想是能参加香山基督教灵修院（在香山植物附件近，那里有一座教堂）进修一年，但未能如愿。

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气象局气科院工作，平日住单位。小儿子在青龙桥北京第67中学上学。大儿子说，他们一家生活和睦，从不吵架，与邻里相处甚安。由于是外来户，生活习惯与周围的当地农民不同。陈慧恩有文化，懂英语，又有基督教信仰，受派出所监视。他们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也和人不同。弟弟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但从来拿附近田里的瓜果老玉米。他们一家引起人们的特殊看待。

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67中学的红卫兵，由当地的居民组长的儿子带领，前来抄家，理由是：陈慧恩搞反革命特务活动。这个中学的红卫兵成员主要是附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子弟，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红五类”子弟——是当时抄家，打人最严重的一族。

陈慧恩不承认这妄加的莫须有罪行，也不肯否定基督教信仰，于是遭到红卫兵用军用皮带的疯狂毒打。钟永生下工回家也被抓来一起挨打。两个人被打得体无完肤，上衣全是鲜血，看不见一点衣衫的本色。

后来红卫兵叫来卡车，把他们和其他的“阶级敌人”扔上汽车，送海淀区公安局收押。她的丈夫说，在押送过程中她还继续遭到殴打。一个男红卫兵还站在陈慧恩的肚子上践踏。陈慧恩当晚死在海淀区公安局，火化后尸骨无存。

她的丈夫钟永生活了下来。钟永生在1995年12月24日安详去世，享年九十岁。

陈慧恩生前常去香山灵修院。她的一个儿子说，那里有个修女，是妈妈的朋友和同道，他从小一直叫她“许四姑”，不知道全名。修女“许四姑”比陈慧恩年轻一点，和陈慧恩一样，也在同一时期被打死了。1966年8月下旬，是北京红卫兵最为残暴的时期，每日打死人的数字高达数百。信宗教的人，是被打的主要群体之一。

那年十月，陈慧恩的儿子兄弟二人找到参与抄家的两名红卫兵，问他们为什么打死了他们的母亲。那两个红卫兵说：有人报告，你母亲搞特务活动。联络暗号是“你好，我好，就

他不好”。我们就去了。兄弟二人又问他们抄家中有没有抄到“反革命”和进行“特务”活动的证据。他们说，只抄到一些旧照片和圣经。

后来大儿子几乎每年要求他的工作单位领导和党组织搞清楚问题的性质，但是一直没有音信。此事一直拖到文革后的1990年，通过气象局的全国人大代表程纯枢的提案提出，才得到青龙桥街道办事处的答复：对事件的过程他们一无所知，给了五百元人民币作为补偿。这是文革后对被迫害死的家人赔偿的钱的一般数目。

从来没有人对陈慧恩的死受到批评或惩罚，也没有任何单位主动关心处理这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情，更没有人曾经道歉。后来家人听说，来抄家施暴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得了肝癌，年纪不大就死亡了。传话者说这是对恶行的“报应”。这样的传言表现了人心的倾向，但是不能说明正义已经得到。

◇ 宁德禄，男，1881—1966，天主教徒，北京居民。1966年8月25日下午，北京第41中学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毒打他的妻子以及妻妹。愤怒中他用厨房的菜刀砍了正在打他妻子和妻妹的红卫兵。红卫兵人多他被抓到第41中学校园中。当天晚上红卫兵开“斗争会”把他打死。时年85岁。他被打死的时候，正是红卫兵暴力在北京达到高潮之时。

在2018年的采访中，宁德禄的小儿子宁景仑先生介绍说，宁家在北京老城区居住已经400多年。宁家人从利玛窦（意大利人Matteo Ricci的中文名字。1552—1610。天主教神父。1583年明朝时候来到中国居住，一直到去世）在北京传教时代开始信仰天主教，在万历19年（1591年）受洗，到他已经十三代教徒。1900年，义和团杀死了宁家的十四口人，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文革前他们家居住在北京西城区安平巷26号（1965年以前的老门牌为火神庙10号），是宁景仑的祖父也就是宁德禄的父亲在民国八年购地建造的。1949年的新政府承认市民私人房产，五十年代把他们的民国地契换发了新地契，叫《房地产所有证》。文革开始，这《房地产所有证》不但不再算数，而且成为殴打和打死房屋所有者的“理由”。

宁德禄的父亲在北京经商，有三个店铺（信永和、信成和、信义德），经营瓷器和铁器。宁家从曾祖父开始，甚至更早，就精通武术，尤其是摔跤。民国期间成立北平特别市国术馆后，宁德禄是该馆的主力，四次到南京参加全国运动会，得过射箭冠军。宁德禄忙于武术活动，对家中的生意很少过问。他的父亲雇佣了几个人，辅助管理宁家的买卖，直至1956年的所谓“公私合营”。毛泽东时代，雇工三个到八个（根据不同行业），“阶级成分”就要被划定为“资本家”。因此宁德禄被划成了“资本家”阶级成分。1966年，文革开始，信教的人，住在自己的房产里的人，资本家，都成为文革的暴力打击对象。

1966年8月25日下午，北京第41中学的二十几名红卫兵，闯进了安平巷26号。他们称宁德禄是“反动资本家”和“反动天主教徒”。红卫兵强迫宁德禄的妻子张淑贤和妻子的妹妹张志茹跪在地上，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妻子的妹妹是天主教修女，五十年代初修道院关闭了，她只好住到了姐姐家的院子里。宁家的邻居，当时还是九岁的孩子，说他在宁家看到红卫兵把两个跪着的女人背上的衣服都打烂了，还从厨房拿来酱油和醋倒在受伤的皮肤上。

八十五岁的宁德禄看到妻子和妻妹挨打受辱，愤怒中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冲出来，对正在打人的红卫兵砍了过去。红卫兵人多且年轻力壮，很快把宁德禄打倒在地，打昏了过去。

小儿子宁景伦当时25岁，是北京一家汽车修理工厂的工人，并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他下午五点回到家里，见他父亲宁德禄已经昏死过去。红卫兵涌上来就毒打宁景伦。他很快就被打昏迷了。红卫兵以为他已经被打死了，把他送进了附近的“人民医院”的停尸房。同时，红卫兵把宁德禄抓去了第41中校园。

同时被暴打和抄家的还有在宁家院中居住的一对眼科医生夫妇，李俊生和田文秀。他们是宁家的房客。李俊生当时是第七医院的医生，田文秀是福绥境医院医生。他们已经租了宁家的房子居住多年。他们的两个女儿在那里出生和长大。李医生和田医生在被打得遍身是血之后，也同样被拖到第41中学。

那天晚上，在第41中学的操场上红卫兵开了“斗争会”。红卫兵在操场的领操台上放了桌子，宁德禄站在桌子上被“斗争”，下面站了高喊口号的数百人。当晚宁德禄被殴打折磨致死。他被送进了附近“人民医院”的停尸房。

1966年8月，这条“安平巷”里有八名居民被红卫兵打死。

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数千居民。（官方在文革后说打死了1,772人。他们从未给予名单，只是在报纸的一篇长文章中对这个数字一提而过。）红卫兵得到最高当局的支持和赞扬，人数众多，有警察支持，可以随意抄家打人。在那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这场大规模的暴力杀戮。红卫兵在那个八月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杀害了如此大数字的居民，几乎未遇到任何反抗。被打死的人中，像宁德禄这样能动手反抗的，笔者在长达数十年的调查中，只了解到宁德禄一人。

有人说，这是因为北京的老百姓太老实了。确实，北京是有三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历史上有过战乱和犯罪，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规模的由青年学生来残杀和平居民的事情。人们从无准备应付这样的暴力杀戮。毛泽东利用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把文革暴力推向高潮，这种手段不但残忍，而且邪恶。有人说这是因为普通人没有能力反抗，宁德禄曾经习武，动了手。其他被打的人只能默默挨打，希望下一分钟红卫兵可能住手。实际上，宁德禄曾经收藏了一把清代武将用过的大刀，但是在8月18日大会之后立即在大规模展开的“破四旧”运动中，已经交出了。他用菜刀砍伤的红卫兵，只是缝了针，并无更深的伤害。他却被打死了。他的儿子只是由于红卫兵误认为他已经被打死送进了停尸房而活了下来。

在我的《文革受难者》（有659名受难者）书中，有李文波。李文波家住在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阶级成分”是“小业主”。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李家抄家，毒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红卫兵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然后跳楼自杀了。这名红卫兵后来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讲话，她们的事迹也在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上展出。但是见过或者采访过这名红卫兵的人说，未见其身上留有伤疤。文革后有人说，李文波并不是要用菜刀砍红卫兵，只是要求红卫兵让他妻子去厕所而发生了争执。李文波和宁德禄死于同一日。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当时被送进公安局，两周后在9月12日被法院判处死刑并在第二日就被处死。文革结束后，1981年，法院给李文波妻子“平反”，并称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上文说到宁德禄的儿子宁景伦在那日下午在家中遭到毒打后被送入了人民医院停尸房。实际上他没有死，在半夜苏醒过来，看到了父亲宁德禄也在停尸房中。他为父亲念了“临终经”。然后，他逃出医院，到了他工作的工厂。他的工人同事帮助他躲在工厂，不敢再回家。

那天晚上，在宁家院中租房居住的李俊生和田文秀医生也在第41中学遭到“斗争”和殴打。他们没有死，被放回了家中。第二天和第三天，红卫兵又回到安平巷26号，继续殴打两位医生，就这样从25日到27日，整整打了三天。满院子地上是红卫兵砸碎的东西。红卫兵叫来大卡车，把他们家里的东西都拉走，只给留下了几床被子和几个碗。

在这血腥的“红八月”后，宁景伦和他的家人被“遣返”，这个词在1966年时的意思是从北京驱逐出去，驱逐到农村老家。他们被驱逐到他母亲的老家，保定附近农村。他们的房子被街道和房管局安排的人占住了。那个夏天，北京城有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城。有的人在到达农村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农村后贫病交迫很快就死亡了。两位房客李俊生和田文秀医生也因为他们的“历史问题”被驱逐到东北老家农村，文革结束后才回到北京。

1967年8月25日，宁景伦的大哥宁景昆在四川死亡。大哥和父亲同月同日死亡。大哥是在四川德阳市开起重机的工人，是技术很好的工人。由于他的这种“坏家庭出身”，他被一个名叫“风雷纵队”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斗争”而死亡。那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说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思想反动”，说他是“畏罪自杀”的。宁家人不相信这个说法。他们一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教会认为人的生命来自上帝，应该由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来决定生死。他们不自杀。

文革结束后，1983年，街道委员会给了宁德禄“结论”。（结论中说：宁德禄“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逝世，终年七十六岁。”）那时候宁德禄已经被打死17年了。宁景伦先生说，他父亲被打死的时候，是85岁，而不是“结论”上说的76岁。

宁景伦和两位医生租客的大女儿李凌珠结婚。他们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1966年时，李凌珠是北京矿业学院的学生。婚后他们住在宁家被“遣返”去的保定附近农村。1984年，宁景伦和李凌珠夫妇回到了自己从小居住的院子。还给了他们两间房间，后来增加到三间。其余的房间则被别人占住了。院子里原有的葡萄藤和花池都毁掉了，盖满了杂乱的小厨房。宁先生也一直只好在一个自己搭建的很小的厨房里做饭。他们的房子至今没有全还给他们。

宁先生说，院中一间房曾是第41中学的原校长的妻子和儿子住着，他们也已经去世多年。宁先生的父亲在第41中学里被打死。第41中学的校长在文革中被打死。他不知道这位校长的名字。只听说他是从附近的“福绥境大楼”上跳楼身亡的。联系宁先生父亲的死和宁先生自己被送进停尸房里苏醒后逃出的北京，这种死亡与其被叫做“自杀”，不如叫做“被打死”更加确切。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自杀”。这座大楼现在还在，八层楼，原来叫“公社大楼”，用1958年建造“人民大会堂”等所谓“十大建筑”的剩余材料造成。当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准各家自己做饭吃，都要在大食堂吃饭，所以这座大楼的设计没有家庭厨房，只有大食堂。这已经非常荒唐。到了文革，因为是附近一带最高的建筑，有不少人到这个“红旗大楼”来跳楼。这个大楼变成恐怖和血腥的地方。

第41中学（当时是男校）和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相隔很近。我采访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老师陈寿仁的时候，了解到文革中女三中除了校长和教员共五人被迫害致死外，还有七个工作人员的配偶被迫害致死，其中有于晓岩的丈夫，第41中的校长。陈寿仁老师只知道这位校长姓齐，不知道他的姓名。找到当年第41中学当时的学生询问，说校长的名字是齐靖宇。宁景伦先生说，齐校长是被打死后从楼上扔下来的，不是自杀。

几十年来，每到8月25日，宁先生一家都要为受难的父亲和大哥做弥撒。在往年，是分成两部分做，一方面打电话给曾经的流放地保定青苑县东闾村的教堂，拜托神父和教友们为自家故去的亲人做弥撒，同时又在家里自己做。2016年，由于老家的教堂正在重建工程中，他们把神父请到了家里。

多年致力于保护北京老建筑的华新民女士目睹了这次弥撒。她写道：“我今早见证了这场令人无比悲痛的弥撒。参加弥撒的，除了宁李夫妇和神父以外，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和幼小的外孙女。先是由宁先生简短讲了一下父亲和大哥如何惨死，然后是他女儿朗诵《感恩祭典》中的一段，她半天都张不开口，眼睛里全是泪水，最后终于哽咽着开始念了。再然后是神父诵经，以及一般弥撒里的那种过程——祈祷、唱圣歌、洒圣水、食圣餐等。

弥撒完毕，宁家人从抽屉里翻出来几张仅存的老照片给我看，其中一张是1954年拍摄的，就在他们现在居住的北屋前面，李凌珠的三舅搂着她和妹妹，还有从葡萄架垂下的几根枝条。”

笔者在2018年夏天第一次见到了宁景伦先生。之前我只和他通过电话。他77岁，气色很好，身板笔挺，态度和蔼。客厅墙上挂着教宗给他的祝福信，是英文的。他请我给他作一个中文译本，我离开他家后很认真地翻译了也打印好了送给他。他说，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有信仰。教会要他不要恨，要爱人如己，他照那些话做。但是事情还在那里，作为回忆。不是仇恨。他给我讲他家的文革经历，清晰明白，坦诚真实。他的身上有着一一种宗教的光泽。这很难描述，但是可以真切地感觉到。

◇ 马秀清，女，满族，佛教徒，家住北京东城区九道湾中巷13号。1966年8月26日，中学生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毒打她和丈夫。马秀清在当天死亡。时年47岁。

丹增加木错，男，藏族，马秀清的丈夫，汉文名字是白庆增，老家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是拉布楞寺六世活佛，佛号曲总仓。属黄教。他在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马秀清一起遭到红卫兵毒打，受到重伤。他没有在当天死亡。家人想要把他送进医院，但是医院拒绝给予治疗。医院要“证明”才肯接受这样被打伤的“阶级敌人”。家人去“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要证明，没有拿到。他在家呻吟了七天后，于9月3日死亡。时年55岁。丹增加木错在1937年从藏区来到北京，先住雍和宫。后来他和马秀清结婚。他们买了九道湾的房子。自住。房子有290平方米，有个院子。

马秀清夫妇只有一个儿子。他说，他小时候，曾经跟父亲去过政协礼堂。他父亲担任过甘肃省政协委员。但是在1959年“西藏平叛”之后他家地位一落千丈。他父亲被安排进三轮车社，每月给十来块钱生活费。由于他的这种“家庭出身”，他在1962年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学，进工厂当了工人。

1966年8月26日，北京红旗中学（现为第171中学）红卫兵去他们家抄家打人。那时正是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高潮之时。打死人的一名红卫兵首领，后来参军当到了团长。文革后被复员了，也受了处分，因为他还打死了别的人。家人在文革后没有得到作为赔偿的钱。

当时只给家人留了一间房住，而且要交房租。290平方米房子成为九家人住的大杂院。文革后。还给了他们两间房。现在马秀清的儿子一家住在那里。直到现在，也没有把他们的房产还给他们。他们的父亲母亲被打死在这两间屋子门口两三百米远的地方。五十多年来，他们每天看着门前父亲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地方出出进进。这是怎样的折磨啊。



~~~~~  
【生逢乱世】

且与鬼狐为伍

• 蓝英年 •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有人告诉我礼堂里有我的大字报，我吃完晚饭便到礼堂去看。礼堂里贴满声讨我的大字报，成了我的大字报专室。我一篇篇看过去，大字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白字连篇，语气非常凶狠。但鸡毛蒜皮的事多，要害的事少。只有一张以系总支三位委员联名写的大字报最有分量，揭发我反对中央文革和吹捧赫鲁晓夫，并有我亲笔写的文章和使用过的教案为证，很难赖掉。我算被揪出来了。我从礼堂出来，骑车直奔水上公园。我需要冷静思考对策，使自己摆脱险境。路上我不禁背诵起张元幹的《贺新郎》来：“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大概因为这首词与我当时的心境吻合吧，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涌出。我高声朗诵，不怕红卫兵听见。听见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听不懂。我骑到水上公园，把车靠在柳树上，自己坐在河边。我得考虑被揪出来后如何对付。我确定两点，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伤害并尽量帮助别人。我对“最高指示”早已失去狂热，不仅失去狂热，而且不再盲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我欣逢其事。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道：“师大附中的同志们万岁！”我听了热血沸腾，愿为他牺牲一切。在以后形形色色的运动中，我都是骨干。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那时我是材料组组长。虽区区组长，但岗位非常重要，批判肃反对象的材料都经过我们整理。不久我便与领导小组负责人发生第一次冲突。他要把一个十七岁的炊事员定为反革命。这个炊事员的罪行是经常在厨房里表演“反动节目”，逗大家一乐。他自己先说一段快板：八路军吊郎当，破鞋破袜破军装，破子弹破大枪。说完有人问他：你是谁？他挺胸说：我是蒋介石第二。听的人哈哈大笑，有时还让他再来一遍。接到检举材料后我们去调查，他又高高兴兴地表演了一遍，一点都不害怕。负责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叫我整理他的材料。我说他是落后青年，二百五，哪有反革命公开说自己是蒋介石第二的？这个青年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平时干活卖力，人缘很好。我坚决不同意整理他的材料，负责人让步了。在我担任材料组组长的时候他没被定为反革命，他以后的命运如何我就知道了。

以后我又与负责人发生过几次冲突。他在会上揭发肃反对象时往往歪曲我们整理的材料，添加很多材料上没有的东西。我找负责人，指出他说的很多东西材料上都没有。他说以后注意。以后他不但没“注意”，反而变本加厉，添加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耸人听闻。我问他要不要实事求是，不根据调查材料胡乱揭发不等于坑害人吗？他火了，说我一贯右倾，立场站在敌人那一边，不适合担任整理材料这项重要工作。很快我就被撤下来了。

我根据亲身的经历对揭发胡风的材料也怀疑起来。从信中摘出几个句子就下结论，很可能断章取义。比如“他说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去掉“国民党骂”，或改为删节号，就变成“他说共产党是共匪了”。这种深文周纳的手法自古有之，是统治者迫害文人司空见惯的伎俩，为什么在新中国又死灰复燃呢？不久又开始鸣放和接踵而至的反击右派斗争。鸣放

期间家里人告诉我不许胡说八道，不要贴大字报。我说很多人说的话都有道理，他们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以便改正，有什么不好？我姐夫厉声说我是温室里的花，不懂得阶级斗争。我的三个姐夫都是从延安来的，两个还参加过长征，是部队的领导干部。老干部都有过挨整的经历，所以说话非常慎重。比如，我曾问一个姐夫，彭柏山怎么会是胡风分子，他只回答了一句：“彭柏山打过仗。”答非所问。其实表达了他对彭柏山的态度。我中学的几个老师也是从延安鲁艺来的，给我讲过不少延安整风的内幕。内容就是韦君宜在《思痛录》里所披露的那些，但在五十年代初期没到过延安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的人也不会说。我脑子里自然比同龄人多了几个问号。我这几位老师大概在延安时期整得还不够，没有汲取教训，说话随便，五七年通通被划为右派。

我听姐夫们的话，鸣放期间没贴过一张大字报，学生要我参加罢课，我劝他们不要罢课，并说你们不去我一个人也去上课。我表现得算不错了吧，但仍然险些被划为右派。原因是不积极参加反右运动，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批判会上从不发言，会后还同右派来往。书记认为我在心里抵触反右运动，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还是父亲蓝公武在冥冥中保护了我。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当全国划右派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党为了表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尊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打击，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刘少奇主祭，董必武代表党中央追认父亲为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党委就不便把我划为右派分子了。

一九五六年我还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惊愕不已。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是联共党员，我为了练习口语，经常到他们那儿去。闲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红杠子队”（即格勃乌，克格勃前身）厉害极了。一九三八年张鼓峰事件后，海参崴黑头发的，除日本人外，都抓起来审查。有的人被关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集中营。比我大二十岁的曾先生，在里面蹲了十七年。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因为头发是黑的。张鼓峰事件是日本人挑起来的，但居住在海参崴的日本平民却平安无事，只被遣送回国，斯大林不敢惹日本人。曾先生跟我很要好，给我讲了劳改营中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我当时半信半疑，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才相信。赫鲁晓夫所列举的事实并非造谣，从此我不再盲目崇拜苏联。

我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在原单位呆不下去了，山东大学来要人，我欣然前往。一到山东大学便披戴大红花光荣下放到崂山脚下的农村劳动锻炼。在这里我迎来大跃进。没有经历过大跃进的人很难想象大跃进荒唐到何种程度。比如公社决定扫盲，规定每个人，包括老人和妇女，三天内，不脱离生产，认三千三百个字。到第四天，便敲锣打鼓到公社报捷去了。比这更荒唐的例子还很多。我们带薪劳动锻炼，比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强得多，起码没饿死人。但对人祸的感受却同样强烈，年轻时代的理想烟消云散，不再崇拜权威。

二

文革初我被揪出来，打入牛棚。大概由于出身好，年纪轻，被任命为牛鬼蛇神队队长，每天带着十七八个牛鬼蛇神（多半为老教师）劳动。出发前先齐声高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要是我不老实，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指挥得很快，唱完马上把他们带到校园最偏僻的角落拔草。我对他们说咱们离红卫兵远一点，大家愿意怎么拔都行，可以坐着，躺着，但红卫兵要来了，赶快蹲起来。

如果红卫兵为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而在教室里争吵不休，放过我们，这一天便平安无事了。但这样清闲的日子越来越少。一天，红卫兵把全校牛鬼蛇神押到礼堂批

斗，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我们拔草的地方，红卫兵向我们吼道：“快滚进来！”我们赶紧从草地上爬起来，加入牛鬼蛇神的行列。我们被押进礼堂。礼堂里摆了一排纸糊的帽子，叫我们自己戴上。我立即挑了一顶较矮的、糍糊干了的帽子戴在头上。动作慢的，或不肯戴的，红卫兵给他们戴上最高的，刚刚糊好的帽子，糍糊从头上流到下颚。上台接受批斗前，红卫兵端来一盆蓝墨水，叫我们画成花脸再上台。我双手蘸墨水，把额头和脸颊抹蓝，尽量不让墨水流进眼里。心理系的一位副教授，不但不抹，反而大喊起来：“你们这样做是破坏毛主席的政策。”话音未落，蓝墨水便从他头上倒下来。我想他怎么这么糊涂，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不能往牛鬼蛇神头上倒墨水？比这严重得多的事他老人家也没说过话。墨水流进眼里会伤害眼睛的。我利用牛鬼蛇神队长的权力，向他喝道：“你对红卫兵小将什么态度，还不滚出去！”他出去的时候，我用手指在眼前晃了晃，示意他赶快去洗眼睛。我这样做是很冒险的，我有什么权力叫牛鬼蛇神离开批斗的现场？原来红卫兵来自各系，分成各派，没有统一的指挥。谁都管事，谁又都不管事。我让他滚，这派不管，那派也没管。我钻了红卫兵领导不统一的空子。红卫兵批斗外语系教授陈先生，质问他为什么诅咒毛主席早死？他回答说“毛主席万岁”在英语是假定式，表示希望他长寿，但人活不了一万岁。他马上遭到一顿打。他还要同红卫兵讲理，我已经站在台上，无法也无力制止他，只能眼看着他挨打。这次是全校批斗大会，有书记和校长们在前面顶着，我虽罪孽深重，但只有外语系的红卫兵知道，别的系的红卫兵并不知道，所以没批斗我，我只算陪斗。但红卫兵打人的场面我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同他们无理可讲。其实这一点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很多教师却不了解这一点，还要同红卫兵讲道理，大概还是毛著没学好的缘故。

三

我在外语系的“地位”从牛鬼蛇神升到现行反革命了（红卫兵把“现行”写成“现形”，也通。我原先是俄语教师，其实是暗藏的反革命，终于现出原形）。红卫兵批斗我，说我是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我对他们承认我就是，烧成灰都是。我弯腰做“喷气式”做得标准，无懈可击。所以我挨斗的时间少，陪斗的时间多。我有机会观察红卫兵。我教四年级两个班，四十个学生。最凶狠的不过五六个。都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是两个班里学习最差的学生。其中有位女生，两个班里唯一的党员，已经蹲了三年班。因为吃够了她的苦头，我至今仍记得她的芳名。她口齿不清，大舌头。俄语有个颤音，她四年都发不出来。我晚上经常辅导她，什么办法都用过，比如含水发颤音，但毫无效果。她对动词也不理解。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她说睡觉不是动词，睡着了怎么还会动呢。在我之前的一位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她明白表示状态的词也是动词。她不适合学俄语。我为她的前途着想，向总支书记建议将她转到政教系去，毕业后做个政工干部。我同总支书记的谈话被揭发出来，成为我迫害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的一大罪状。另外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功课比这位女生略好，没蹲过班。但他们记不住生词，弄不清语法的变格变位。考试多半不及格，或勉强得三分。他们知识面狭窄，或者说除党的宣传口号外，什么都不知道，并且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他们一句话就能把你驳倒：那些都是封资修的破烂玩意，知道越多越反动。人总有表现欲望，他们没有别的可表现，除自己的家庭出身外（用动词“骄傲”造句，他们的造句都是“我以我光荣的家庭出身为骄傲”），只能表现对标语口号的狂热响应。他们根据某一句话，或党在某个时期的政策，判断一切事物。一次我因北京修建地铁谈起地铁，我说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都有地铁，莫斯科的地铁修建得较晚，但最漂亮。有个考试不及格的男同学批判我，说我放毒，没有一点阶级觉悟。伦敦和纽约的地铁是供资本家坐的，莫斯科的地铁是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我竟说他们的地铁比中国修建得早，还说莫斯科的地铁最漂亮，安的什么心？我立即承认我说这些话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红旗落地，国家变修。我先把纲上得最高，他们反而无法表现批判我的本事了。生长在天津市的大多数学生与他们有所不同，虽然也给我贴大字报，但内容都是从别人的大字报上抄来的，没有新的揭

发。我课下同他们交谈时，介绍过俄国美术和音乐流派，介绍过俄国和苏联作家，甚至介绍过已成为批判靶子的萧洛霍夫。这些他们都没揭发。他们心里同情我，一次我扫地时，一个同学把纸团扔进簸箕里。我在没人的地方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今晚批斗可能下跪，裤子穿厚一点。我钦佩他的胆量，竟敢给现行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我也感到慰藉，并非所有青年人的革命意志都坚硬如钢。一九六九年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那位发不出颤音的女生和出身好的几位学生都留在天津市，成绩优秀的学生分配到河北各县。

四

我挖空心思，一心琢磨如何推掉两项严重罪行：吹捧赫鲁晓夫和攻击中央文革。前一项可以推到教育黑线上去。我是根据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讲赫鲁晓夫的一篇报告的，教案中就有称赞赫鲁晓夫的话。我受到教育黑线的毒害，是受害者。第二项很难赖掉，因为是我在文章里写的，批评姚文元打棍子，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批评他自然是攻击中央文革，白纸黑字，岂能赖掉。尽管文章是一九五八年写的，那时姚文元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能说得清吗？

我的工资被红卫兵扣发了，每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母亲和妻子都叫我增加营养，不要把身体搞垮，学校伙食不好，可以到外面加餐，妻子从北京偷偷给我送钱来。我们在天津北站的一个公园里会面，像地下工作者接头。她们的建议与我不谋而合。我在校园里挂着牛鬼蛇神牌子，我的牌子较小，可以侧过来夹在腋下，从远处看好像夹着一本书。一出校门我就摘下来放进书包里。我和史学家漆侠先生到附近的饭店吃饭。他的牌子大，我们把牌子从中间剪开，用细线缝上。出校门叠起来放进书包，进校门展开，红卫兵看不出来。我们点荤菜，喝啤酒，吃得痛快。但不久被红卫兵撞上了，当场把我们批斗了一顿。我问漆先生，还吃不吃，他说换个地方，照吃不误。我们到离学校远的饭馆吃饭。以后红卫兵忙于打派仗，对我们管得松多了。漆先生又开始治学，为他后来出版的《宋代经济史》做准备，并多次劝我读书，甚至叫我为写果戈理评传做准备。这当然做不到，且不说没有资料，我也从未有过写专著的打算，与他不同。他是著名的史学家，已出版过《王安石变法》等专著。读书还是可以的。晚上独居宿舍楼，我开始读书。读的是三注三评本《聊斋志异》。这是张中行先生的挚友韩文佑先生借给我的。我过去没通读过《聊斋》，只读过《画皮》《崂山道士》《促织》等几篇。夜阑人静，红卫兵小将们都闹革命去了。我打开《聊斋》，渐渐进入蒲松龄所创造的鬼狐世界。我最爱读的是写花仙的故事《葛巾》《黄英》和《香玉》。爱不释手，竟抄起来，就抄在封皮上印着林副主席题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笔记本上。蒲松龄为我打开了美丽的鬼狐世界，他绝妙感人的文字同样让我着迷。读《聊斋》是我那段时期生活的中心，并受益至今。

五

我过着两种生活，现实的生活让我难以忍受，便逃入鬼狐世界。鬼狐给了我力量，对大喇叭广播的暴力语言似乎增强了承受力，但心病并未消除。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仍像秤砣似的压在我心上。趁红卫兵打派仗之际我溜回北京。同妻子一起到学部看大字报。忽然看到有一张揭发何其芳如何推行文艺黑线的大字报，其中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大字报说文革前姚文元曾想调到文学研究所来，但何其芳拒绝接受，说姚文元写文章强词夺理，打棍子，文学所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我看过后心中暗喜，但这绝非幸灾乐祸。我与何其芳无冤无仇，何况他还是我敬佩的作家。我特别佩服他的文字，他的书我都有，至今仍藏有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画梦录》。何其芳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无法证实，反正他是走资派，已被打倒。但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我的救命稻草。我马上抄下来，和妻子连夜写造反大字报。何其芳是党内文学权威，我对他过于崇拜，中了他的毒，并在他的影响下，错误地攻击了姚

文元同志。我吹捧赫鲁晓夫是中了教育黑线的毒，攻击姚文元同志是中了文艺黑线的毒，虽中毒太深，但仍然是要革命的，不是牛鬼蛇神。我把罪责一股脑推到教育部和何其芳身上。我这样写并不会增加何其芳的罪行，他专案组的人对天津一名无名小卒受到过他的影响不会感兴趣，但这样做有可能挽救我。大字报写好后，我把它贴在红卫兵的两个司令部（井冈山和八一八）之间的墙上，我造反了，自我解放。也许真能解放，也许挨一顿批斗，再次把我赶回牛棚。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因为大多数红卫兵对我没有恶感，恨我的几位革命小将抄家的时候手脚不大干净，没当上头头。早上贴出后，中午去刺探，在大字报前走来走去，看看红卫兵的反应，没有批斗我的迹象。下午又去，一个红卫兵竟叫我“老蓝”，我受宠若惊，觉得造反成功了，从牛棚中挣脱出来。多年后听井冈山司令部的红卫兵说，他们讨论过我的造反声明，大多数红卫兵认为现在矛头应指向走资派，不管我了。八一八司令部如何反应我就知道了。

六

《聊斋》中有一篇《书痴》，写到烧书。郎生酷爱读书，终日讽诵，不管其他事。终于在书中找到颜如玉。颜如玉让他把书全部烧掉，免遭灾祸，郎生不肯。邑宰以郎生为妖。

“见书卷盈屋，多不胜收，乃焚之；庭中烟结不散，冥若阴霾。”这是蒲松龄的艺术虚构。烧书不是“烟结不散”而是火光冲天。八月的一天晚上，我们牛鬼蛇神正在学习，红卫兵冲了进来，命令我们到操场烧书。我们赶到的时候，书已点着，我让老鲍跟我一起拨拉烧着的书，我递给他一根长棍子，他嫌长，自己拣了一跟短的，我劝他他不听。这根短棍子几乎要了他的命。老鲍自然是牛鬼蛇神，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所有牛鬼蛇神都大，那年八十二岁。他是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后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外文系资料室管理资料。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他留美时期喂梅花鹿的相片。他就是因为这几张相片被揪出来的。老鲍个子矮小，只有一米六几。他拿着短棍子拨火，被火苗烧着。后面是红卫兵，前面是火堆。后退必遭红卫兵打骂，只能向前拨火。我的棍子长，拨火烧不到自己，想跟他交换已不可能。书烧成灰烬时要用水浇灭，我负责打水。每次打水都偷喝很多水。老鲍则一直被火烤着。八月天气闷热，一个年过八十多岁的老人如何受得了，终于倒在灰烬上。幸亏灰烬已被我用水浇过，不然会被烧死。红卫兵骂他偷懒，但没再管他。烧完书后，我把他抱回教研室，放在桌上。他胸上，胳膊上，都烧出燎泡。我先让他喝水，然后打了一盆凉水给他擦身，他渐渐缓过来，对我说：“他们都是长虫！”我扶他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三轮车拉他回家。人有做人的底线，比如子女不能打父母，学生不能打老师，对年长者礼让，对年幼者爱护。底线被突破，人就不成其为人了。红卫兵都是年轻的后生，怎么对老鲍没有一点同情心呢？我联想起在北京火车站看见红卫兵把一群老太太押送出北京的情景，她们身上挂着“地主婆”“资本家臭老婆”等牌子，有的干脆把成分贴在额头上。她们多半是北京的老住户，因出身而被轰出北京。她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有的人双腿瘫痪，让人看了心碎。押她们的红卫兵没有一点同情心，嘻嘻哈哈说笑，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们笑得更开心。看到祖国的花朵得意的样子我同样心碎。

七

红卫兵打派仗后，便不管我们了；不仅不管革命教师，连牛鬼蛇神也不管了。而我这时已成为人民的一员，忝列革命教师行列。我有时回北京，在天津的日子便跟随韩文佑先生一起读鲁迅的杂文。从第一卷《坟》开始。我先读一两遍，晚上坐在他宿舍前的马扎上，同他讨论，听他讲解。韩先生对鲁迅作品之熟令我惊讶。他不仅对每篇都熟，甚至能背出句子和段落来。韩先生讲完后，我回去再重读他讲过的几篇，接着按顺序读下面的杂文。我们就这样一直读完第六卷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平均每篇都读过三四遍。韩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对北大、清华教授的趣闻逸事知道得很多，也讲给我听。其中有关清华教授的逸事，张

中行先生写入《负暄琐话》，也是听韩先生说的。韩先生还把周作人、郁达夫和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借给我看，并且都是初版本，让我眼界大开。他让我先看周作人的《谈龙集》和《谈虎集》，然后再看《雨天的书》和《自己的园地》等集子。我读周作人比读鲁迅吃力，对他那些抄书文章读不下去。韩先生说过了五十岁我就读得下去了。五十岁以后，文革早已结束，是我最忙的时期，办刊物、翻译书、带研究生，没有时间再读周作人的书。现在过了七十岁，仍没再读，只读过论述周作人的著作。那时听韩先生讲鲁迅的还有一位中文系的讲师周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教师。他专门研究叶圣陶，但对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也很熟悉，他也谈到很多大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陷。可以说文革期间我上了半个中文系。如今这两位先生都已作古，回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心里仍充满感激，没有他们不知多少时间会白白浪费掉。

军工宣队进入后，就不能再同韩先生一起读书了。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北平沦陷期间韩先生与周作人有过往来，还同朋友办过刊物，这些成了严重的问题。那时把我们教职员编入三种学习班：一类属于有严重问题的，集中住在学校交代问题，不许回家。第二类属于有问题或思想反动的，一面学习，一面交代问题，但可以回家。第三类是普通教职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觉悟，争取思想尽快革命化。我被编入三类学习班，韩先生编入一类学习班，我们两人的处境颠倒过来。我们不能再见面。三类学习班师生混编在一起，学生领导我们学习毛著。每天三个单元，坐在一间教室里学习，即所谓三磨：磨时间，磨嘴皮，磨裤子。我当时已属于革命群众，地位与红卫兵相当，但政治上仍低人一头，在学习班上仍是死角。我过去和现在都非常厌恶冗长空洞的发言，可那段时期对这类发言不但不反感，反而由衷感激。如果没有人发言，可能叫我发言。我不得不违心说套话，那滋味难受极了。学习班上有位同学是结巴，喜欢发言，能够结结巴巴讲一小时，我对他简直感激涕零，希望他一直讲下去。有人发言，我便可以回到《聊斋》中去，或在脑子里复习韩先生讲的鲁迅，或复习过去背过的诗词。听着他结结巴巴的发言，我想的是《王桂庵》中的水仙词：“钱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还有位爱表现的学生，喜欢卖弄辞藻，但又用词不当，常念别字，听起来很好玩。比如他把“造诣”念成“造脂”。大概是他新学来的词，颇为得意，一连说了几遍。同学们没有反应。我想起《嘉平公子》：“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我脸上大概露出笑容，这个家伙以为我听得人迷了，以后对我特别客气，叫我“老蓝”。我每天都在脑子里复习学过的东西，从不在下面“开小会”。主持会的同学认为我专心听别人发言，态度很好，只是发言太少，如果积极发言，可以不算死角。不久我又获得一个表现进步的机会。

校军工宣队号召革命师生开展大批判，外语系军工宣队要俄语专业学生批判苏修。他们大概从中央首长的讲话中知道苏联有个萧洛霍夫，是苏联文艺界修正主义的鼻祖，便决定批判他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军工宣队头头想出风头，希望外语系的批判文章至少要在全校广播，争取登在校刊上，最好在天津《文联红旗》上发表。他们顾不得阶级路线了，找了三位功课好但出身不大好的学生，由他们组成批判小组，任命一个学生担任组长，并给他们找了一间教室。批判组的学生立即身价十倍，不参加学习班的学习，随意外出搜寻材料（图书馆已经没有了），一起构思批判弘文。但他们只是二年级学生，不仅俄语还没入门，也缺乏起码的写作能力。我敢说，除文理不通的大字报外，他们没写过任何东西。他们写出的第一稿，连系军工宣队都看不上。但他们是革命小将，不会被困难压倒，拿出三天时间务虚，学习毛主席著作，怀着对苏修的仇恨，再次投入战斗。第二稿系军工宣队通过了，但被校军工宣队打回来。这些都是我参加批判组后才知道的。时间有限，系军工宣队急于出成果，通知我参加批判组。有人说这叫以毒攻毒。我提出不参加学习班的学习，并且要求回宿舍去写。他们居然都答应了。我把学生写的二稿拿回家，打开一看，觉得纲上得不坏，只是逻辑混乱，文理不通，对小说的时代背景毫不了解，对故事的情节一无所知。我向姚文元同志学习，保留了学生上的纲，理顺逻辑，改正病句和错别字，一篇蛮不讲理的批判文章就炮制出

来了。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革命战争万岁！》，两天后我把眷清的稿子交给批判组组长，对他说他们写的文章很好，我只稍微改了一点，如改得不妥，请再改回来。《革命战争万岁！》很快便以外语系军工宣队的名义在全校广播了，并一连广播了几次。接着刊登在校刊和《文联红旗》上。军工宣队非常满意，批判组的小将得意洋洋。我有机会就向人说，这都是红卫兵小将的功劳，我没出什么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军工宣队竟给了我半个月的假，使我和妻子爬了一次几乎没有游人的黄山。

我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比很多人轻，浪费的时间也比不少人少。我毕竟还没有完全停止学习。这与我对象文革的认识有关。文革一开始我就认定又是一次荒唐的政治运动，决不能狂热投入，而要尽量在运动中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但运动如此猛烈发展，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是我始料不及的。现在对文革的权威评价是彻底否定，因为文革把国家的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这算是经济账，当然对。我觉得还应算一笔伦理道德账。文革把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同样引向崩溃的边缘，而后者对中华民族的损害决不小于前者。今天社会上出现的很多负面现象难道与文革无关？我想弄清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设立过各种假说，又都被我一推翻。我经历过文革，却无法真实地、全面地认识文革。看别人的著作，也不能完全得到解答。也许我们亲历文革的这代人智力不够，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

□ 摘自《那些人，那些事》，蓝英年 /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